

# “文革”期间高考的废除及其危害

邓微达

**摘要:**“文革”期间,高考制度被废除十年,全国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新办法。这一招生办法存在许多弊端,包括影响教育公平、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下滑、造成思想混乱以及导致人才匮乏。高考是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教育制度,废除高考是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文革”;高考制度;废除高考

DOI:10.16391/j.cnki.jyks.2017.01.002

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中国高考制度曾一度被废除。这对当时国家高等教育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不仅导致国家人才出现断层现象,还导致中国在诸多研究领域落后于其他国家,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本文通过对“文革”期间高考制度被废除进程的评析,力图阐明这一做法所带来的危害,并提出对当今高考制度发展的启示。

## 一、废除高考制度的过程

高考制度的废除主要源于毛泽东主席于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该讲话的主要意思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当时正在实施的教育制度的严肃乃至严厉批判;二是对新教育制度基本方向与主要内容的定位与描述。关于第一个方面,主要体现在大家都熟悉的这段话:“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关于第二个方面,毛泽东认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

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厂做工,在实验室作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高中毕业后,就要去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sup>〔1〕</sup>

毛泽东主席的这一讲话,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观点,强调的就是“破”旧教育制度,“立”新教育制度。按照这一思路,中共中央随后在1966年6月1日批转了高教部党委《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这一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就招生而言,突出强调继续使用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生源主要是经过各种政治运动和重大事件考验的高中毕业生;二是就去向而言,大学生毕业后应该要有多种选择途径,可以在一线继续劳动,成为有文化的工人与农民,也可以做干部,或者从事技术工作;三是在一定程度上把对高考招生的决定权由中央下放到地方。

同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该

作者简介:邓微达,女,加拿大籍,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厦门 361005)

报告进一步勾画了拟议中的新教育制度的框架,正式废止了持续多年的高考招生办法,明确实施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新办法。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开始采用新的招生办法,突出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新特征,宣布建国以来实施的升学制度予以终止。

事实上,对建国后实行的升学考试制度的辩论已进行了一段时间,其突出代表就是在1966年4月举办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就高考制度进行的讨论、辩论乃至观点交锋。通过对《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简报》(1966年第1-10期)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sup>[2]</sup>

一种意见认为,对现行高考制度的评价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这一制度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主流还是好的,还是符合党的教育路线的,无论从每年招生任务的完成,还是对党“既看成分又不唯成分论”路线的贯彻,都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然而,在当时政治氛围下,这种意见难以成为主流,而且随着会议的深入,这一种意见更是逐步被边缘化。

而另一种意见则是强调现行高考制度存在很多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这种意见给高考制度戴上了很多“帽子”。根据1966年4月17日高教部学生司整理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就高考提出的问题》,把现行问题归纳为两大方面:一是罗列了现行教育制度的主要弊病,包括教学方法不利于引导学生全面发展,也不利于衡量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甚至存在“把学生当作敌人”的倾向,同时,这一制度还特别不利于当时的形势发展,不利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二是强调了现行高考方法的主要问题,包括高考的“一次定终身”特征、考试科目的过多过杂、高考志愿填写的过宽过泛、高考政审中存在的不足、高考体检具有的偶然因素等。<sup>[3]</sup>所罗列的这两大问题,集中体现了旧教育制度及其对应的高考方法的主要缺陷,必须逐步尝试用新教育制度来替代。

1966年7月24日,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这一通知决定不再实行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高教部党委的《请示报告》,并决定此后,高校招生

工作正式下放到各地实行。<sup>[4]</sup>从该日起,由1952年8月开始执行的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彻底被废除。

## 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办法评析

“文革”初期废除高考制度后,在当时举国上下“大破大立”的政治氛围中,各地开始努力找寻新的高等教育入学途径,最终在全国范围实施的就是所谓“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新办法。

在全国各地尝试推荐与选拔相结合方法的进程中,上海机床厂的经验与做法得到了高度肯定,特别是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主席就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的方法,做出了重要批示,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就是著名的“七·二一批示”。在这一精神的推动下,上海机床厂进一步完善了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的方法,并创立了被称为“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新型模式。通俗地说,其主要特征就是“学制短、仍回厂”。“学制短”,就是只学两年;“仍回厂”就是学生毕业后仍回原单位。随后,“七·二一工人大学”逐步成为当时中国新招生制度的一个典范。

在“七·二一工人大学”模式的基础上,中央开始尝试在普通高校中实施这种新的招生办法。1970年6月,在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规定两校招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年龄在二十岁左右、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和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文化程度的限制;同时还要招收上山下乡以及回乡知识青年。具体的招生办法是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规定毕业后要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有部分由国家分配工作。修业年限,根据各专业的具体要求,分别为二或三年。<sup>[5]</sup>全国高校则从1972年开始正式招收“工农兵学员”。

“推荐与选拔相结合”方法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对“一般招生办法”的程序规定。首先实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制度与健康体检标准,其次是参考学生的平常成绩与表现、校领导和师生的评议,再由有关部门审核,最后报各地招生委员会批准,参照志愿、择优录取。

二是对“基本招生对象”的判定标准。基本招生对象指的是,经过重大政治运动锻炼、政治思想素质

较好、教育水平至少达到高中程度、在一线劳动锻炼至少两年的工人农民。此外,对退伍军人、在职干部等也可以采用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三是对“特定优惠对象”的鼓励措施。特定招生对象指的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对这些人员给予优先录取。

四是对“同等考虑对象”的标准确定。同等考虑对象指的是政治思想素质良好、身体健康并提前修完课程的应届高中生。对于这批学生,强调的是“可以”考虑推荐与选拔,但显然不是主要的招生对象。<sup>[6]</sup>

“文革”期间还有一种与“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办法类似的招生方法,被称为“三来三去”,即“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综合各地的经验,这种做法主要有两个特征:

一是招生来源与毕业去向的一致,所谓“哪里来哪里去”,意为来自农村的学生毕业后仍回到原来的社队;而由工厂选拔的学生,毕业后仍回到原来的工厂工作。这种做法所依托的基本思路就是“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再回到实践中去”。

二是培养方向与培养内容的一致,指的是学习必须与生产劳动实践紧密结合。例如,可以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组织教学,根据实践选题组织教学,以一线需要的解决来促进教学;再如,可以采用“几上几下”的办学办法,每年分批组织学生回到社队或企业,回到劳动实践中去,在吸收实践经验后,还回到学校学习。<sup>[7]</sup>

对于“三来三去”的招生分配制度,已有研究者明确指出了其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许多专业缺乏生源;许多单位、部门严重缺乏人力资源;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严重缺乏人才;毕业生所学到的知识无法实际应用等。<sup>[8]</sup>

总体上看,1972年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以推荐选拔“工农兵学员”为主要标志的恢复招生,改变了“文革”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停滞不前的场面,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文革”特定条件下得以延续,可这一做法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学生文化素质偏差。各高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均不理想。由于生源质量过差,入学后补习文化课成为各个高校的必修

课。不少高校安排了文化补习。但花了长时间补习文化课,大多数人仍然没有足够的学习能力学习本科知识。因此,许多高校将补课延至1972年底。就连清华、北大都将文化课补习持续到1972年底。1977年恢复高考后,工农兵学员留校当老师教授大学生。水平过差,低于大学生,连简单的英语都不会读。二是存在大量的“走后门”现象。有干部利用职权保留名额、内定招收名单,还有用请客、送礼等手段,将亲属、上级或自己的子女送进高校。<sup>[9]</sup>

上述两个严重问题及其他问题的存在,表明了“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办法的根本缺陷。因此,从1973年起国家恢复了文化考查,更确切地说,是在推荐选拔办法基本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增加”了文化考查的方式。其依据就是该年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办法中若干问题的通知》。通过对这两个文件的研究,可以归纳出这种方式的三个主要特点:

一是强调了对“又红又专”方针的贯彻,即原有框架不变以确保“红”实现的前提下,增加文化考查以体现“专”的要求。具体就是在坚持群众推荐与政审合格这两个关键环节的基础上,通过对所选拔学生的文化考查来保证学生至少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

二是明确了对文化考查方法的规定。这种办法的关键是:突出“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承认“实际文化程度”。与此同时,在引入文化考查的同时,还要注意防止“分数挂帅”,实际上就是给“专”加了许多限制。

三是允许各地在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尝试。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各专业的要求使用不同的考查内容和方法。<sup>[10]</sup>大中城市一般以区为单位进行文化考察,省、自治区则以县为单位进行。全国不对考查的内容与方法做出统一规定,各地可自行掌握。根据这些规定要求,各地开始了文化考查试验。有些地区举行了全省统考;有些地区如河南省分成初中题和高中题;江苏省则采取座谈、面试、考试三种方法结合的办法;还有地区则全部实行闭卷考试。<sup>[11]</sup>



然而,在恢复或增加了文化考查之后,轰动一时的“张铁生白卷事件”又引发了极大的争议。1973年6月30日,辽宁知青张铁生经过推荐参加招生考试。在最后一场考试中,张铁生因不会做题,在试卷上留下了大片空白,但他在试卷背面写了“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在信中,张铁生表示他因为不愿放弃劳动跑去复习功课,导致了文化成绩极其不理想。他既表示了对文化考查方法的不满,也表达了自己想上大学的愿望。

同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刊登了张铁生的这封信,文章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并加“编者按”称,张铁生虽然交了白卷,但是他写的信中对大学的招生路线问题提出的意见“发人深省”。随后于8月13日,《人民日报》进行了转载,并指出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重大政治问题。该文引起全国上下各地报刊杂志转载,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广泛讨论。而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些讨论实质上变成了对文化考查的上纲上线与口诛笔伐。文化考查被戴上了诸如“复辟旧高考制度”“向教育革命进行反扑”等大帽子,从而形成了全面否定文化考查的趋势。这一封信让张铁生受到重视,最终被高校录取,并被冠之以“白卷英雄”一称。张铁生所写这封信的出现实际上影响了1973年实施的大学招生的路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文化考查的作用,以致于许多高校不愿收取高分学生,反而成绩中下的学生被高校录取。张铁生因此被称为“反潮流英雄”,不仅被破格录取上大学,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应该说,1973年招生工作中加入的文化考查(考试),是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力图寻求教育规律的一种尝试,是对“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招生办法的一种改进,是力图重新回到(至少是部分回归)全国统一考试招生方法的重要一步。这反映了社会期盼扭转极“左”教育方针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试探。但以张铁生的这封信为缘由,使得我国招生制度再一次出现倒退。1974年6月15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1974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将采用文化考查办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上纲上线,将文化考查视作倒退为旧高考制度,认为所出现的问题反映了所谓修正主义

教育路线的影响,事实上宣告了这种改进探索的失败。报告一方面强调在特定条件上对“红”的要求,如对能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有路线觉悟、在特定政治运动中表现好的招生对象予以特别关注;另一方面,该报告提出文化考查可以采用调查访问、座谈讨论等多种形式来进行,而这些方式中有许多都属于非文化考查的范围,这实际上是打着反对“智力第一”的名义来对“专”进行限制,是对“专”的误读。<sup>[12]</sup>

1973年开始的部分恢复高考(文化考查)、提高学生文化素质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事实证明,在“文革”这样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在“极左”教育路线占据上风的大走势下,任何力图扭转国家教育发展不利局面、力图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的做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文革”运动被否定之后,才有可能恢复符合教育规律的高考制度。以1976年11月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自1966年开始的“文革”动乱终于结束了,在邓小平同志的推动下,国家迎来了“教育的春天”。1977年10月21日,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确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废除了“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制度,由各地统一命题,组织考试,从而正式恢复了高考制度。

### 三、废除统一高考的危害

从以上对“文革”十年中我国高等教育入学制度变迁的回顾可以看出,废除统一高考、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存在很多弊端,主要有以下四点。

#### (一)影响教育公平

废除高考制度、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从根本上使得老师失去了教学的动力,学生也失去了学习的动力和兴趣。领导推荐的方法,无法让高校招生实现择优录取,造成就学机会严重不公平。实行推荐选拔的方法,会导致诸多“走后门”现象,这种社会关系竞争和幕后交易会导社会不公平和教育机会不均等。

#### (二)高等教育质量下滑

高考制度可以让教师根据考试的内容和评定标准,安排相应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同时可以根据学生的成绩和反馈,对自身的教学方法进行改良、做出提升。而取消高考制度大大影响了学生的学习能力、

成绩和效率。考试是教育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可以反映出学校评定人才的标准以及学生的水准。考试的一大功能是提高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失去了高考制度,会导致学生失去竞争意识,容易丧失学习的动力和积极性。“文革期间”废除高考制度,导致教师和学生都失去了动力、失去了提升自我的机会,从而使得教育质量大大下滑。中学教育质量的下滑,也导致了大学生生源质量的下降。才会出现所招学生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水平,入学后大学延长补课时间的现象。

### (三)造成思想混乱

在高考制度被废除之前,全国统一入学考试被指责成“智育第一”“分数挂帅”。而“文革”期间,高考被废除,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这一不公平的招生办法使得大批毕业生失去了按时上大学的机会,其中多数人永久地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此外,初中、高中毕业生还被要求“上山下乡”,大学入学办法又强调“政治挂帅”,基础知识得不到重视,导致大批学生的基础知识落后。这一现象导致社会上大批民众倡导“读书无用论”,许多学生因此不再去学校、不再学习,在民众当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 (四)导致人才匮乏

从高考制度被废除开始,大量学生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66年到1969年间,中国停止招收本科生和专科生。1970年恢复招收学生后,数量也较少。根据《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事记》显示,1966年中国高校在校本科生与专科生约为53万人,1969年为108617人,1970年则降至48000人,直到1974年才增至约42万人。<sup>[13]</sup>1966年到1976年,十年间停止培养研究生。同时,1966年到1971年停止向国外派遣留学生。1966年到1972年拒绝接受来华留学生。如果以1965年派出和接受留学生人数为基数,则十年间至少少派出留学生2700人,至少少接受留

学生1400多人。<sup>[14]</sup>十年间,高等院校和中专学校少培养了几百万专业人才,导致“文革”废除之处的社会建设人才十分匮乏。

以史为鉴,警示未来。理论与实践都表明,高考作为一项基本教育制度,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项制度。十年“文革”中对高考的废除,是不符合教育发展一般规律的。“文革”废除高考这一进程最终宣告失败,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高考制度在我国的重要意义。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制度,我们必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去充实与完善,这也正是今天研究“文革”高等教育制度存废的重要启示。

### 参考文献:

- [1][2]杨学为.高考文献(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56,588-608.
- [3]蒋超.中国高考史[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
- [4]杨学为.中国考试通史(第五卷)[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67-77.
- [5][14]刘一凡.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史略[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84,90.
- [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Z].1966-07-24.
- [7]魏国东,李晓军.“文革”时期取消高考制度评述[J].社会科学论坛,2005(1):37.
- [8]樊本富,王连凤.十年之痛 三十年之痒——论高考的废与改[J].考试研究,2008(7):51.
- [9][11][12]李刚.1972—1976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的过渡性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2(5):127.
- [10]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950-951.
- [13]刘光.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事记(1949-1987)[M].吉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王伟宜)